

◀ (上接9版)

为捕风捉影、道听途说耳。

《晨报》《小晨报》行事考

脱离了洋行的穆时英,在继续从事创作的同时,似乎顺理成章地选择进入一个与文学创作关系最为密切的领域——新闻业——讨生活。1934年10月10日,其与叶灵凤合编《文艺画报》,从此开始,到该刊因故停办,转任《晨报》《时代日报》编辑,及至去港之前,穆氏虽拥有“作家”头衔,但在事实上,和许多同侪一样,是过着一种报刊编辑的职业生活。因此,其创作也可分为两个方面: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编辑副刊工作的要求,另一方面才是发挥自己真正的兴趣、施展才华的空间。

穆时英担任《晨报·晨曦》副刊编辑的时间,虽只有短短一年,但在这一年里,同时也还参与了《晨报》的子报《小晨报》的主编,这是包括笔者在内的中外研究者前此所忽略了一点。《小晨报》创刊于1935年9月12日,为小型报,一般只有四版,每日独立发行,头版为国内外要闻,其余三版则充分发扬小报风格,发表旧体诗文,连载掌故、笔记、新旧小说及连环画之外,尤为热衷于报道当日文坛动态。该报正式发行之前并当日,均曾透过沪上有数之大报告诸读者、广为招徕订户。其宣称自己是“划时代的小型新闻纸”,“异军突起短小精悍”,具有“最新颖最醒目的编排”和“最精美最考究的印刷”,内容则“篇篇精彩句句刺激”,总之,“本报执笔者都为新旧文坛一流作家!集大报的人才、经济、机械合作而成!”言辞相当耸动、惊人。

广告也以徐彬彬《凌霄汉阁谈荟》、林庚白《双梧书屋笔记》、叶灵凤《永久的女性》、徐卓呆《李阿毛测验》等长篇说部、笔记掌故即将在《小晨报》连载的消息,作为卖点;还特别指示读者注意作为“青年读物”的《性的犯罪》(戴秋阳译)和《恋爱信箱》(某夫人主答)等固定栏目、译文,并署名“匿名子”的《我们的文坛》系列写作(作者是否为穆时英,还有待严密考证)。至于报价、订阅及试阅办法等必要信息,当然也未被遗漏。最值得注意的是,在其所公布的该报主编位置,赫然列有“何西亚、姚苏凤、穆时英”三

人大名。据此与《小晨报》对照,即可判定,穆时英确为《小晨报》的三大联合主编之一。

袁义勤《上海〈晨报〉琐谈》(《新闻研究资料》1991年第2期)、王尔龄《夏衍与姚苏凤的一段往事》(《苏州杂志》1992年第5期)、张华《姚苏凤与1930年代中国影坛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)及陈坚、陈奇佳合撰《夏衍传》(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版)等论著均记载道,穆时英亦曾担任《晨报·每日电影》副刊的编辑工作,其实不然。姑举二证据:一是读者致《每日电影》副刊编者来信,收信人无一例外,皆为姚苏凤。试想,若非姚作编者,读者何以径直寄信于其人,而非报社其他同事?二是直至该副刊停刊前夕,姚苏凤仍以“苏凤”这一本名撰文,向读者交代该刊将要少登长篇电影理论论文,转而多发表“能够适合一般读者的”“报道”这一新的编辑方针(但不久《晨报》《小晨报》相继停刊,同时说明其停刊是一意外事件,编者事先完全未能预料到),再一次无意间泄露了其作为编者的秘密。这一反一正证据,足以有力地说明姚苏凤(而非穆时英)始终是《晨报·每日电影》副刊的编辑。以上诸论著之误记,应属疏于考证所致。

此外,《简编》记《晨报》终刊时间及穆时英脱离、履新时间均须修正。《简编》谓《晨报》终刊时间为1936年1月20日,实为21日,20日仍照常发行。据张光人《上海〈晨报〉四年史》所记,1936年春节(1月24日)后,该报还曾更名《诚报》发行一期,然旋即奉命终刊,今已成“佚报”矣。《简编》径谓《晨报》终刊后穆氏转任《时代日报·二十世纪》副刊编辑一职似亦不妥。一则《晨报》终刊后,《小晨报》直发行至1月31日(此系目见最后一期;《图画晨报》直至2月2日停刊),际此非常之时,穆氏作为《小晨报》三大联合主编之一,岂可中途退出?二则《时代日报·二十世纪》副刊于是年2月16日始设,其焉能提前履新?

世界文学函授学院及其他

拙文尝论及穆时英兼任世界文学函授学院教授、滨海中学教师经历。就中,如此叙述世界文学函授学院有关史实:“世界文学函授学院成立于1934年3月,一说由汤增敷创办,一说由狂流文学会、中华国学研究会等团体主办,是一所主

要实施函授教育的私立学校。下设世界文学系、中国文学系、中文专修系,招收初、高、预科各种学制之学员,教师队伍更有八十余人。穆时英即是该校第二批所延聘三十余位教授之一……”两可之语显见。但三、四十年代作家朱雯致同事陈梦熊的一通书札,对我们了解该校的创办情况、解其纷乱,颇具参考价值。此信云:

承询汤增敷事,我只记得一九三〇年前后,他与王铁华曾组织草野社,出版《草野》半月刊(?) ,十六开小报,何时停刊,已不清楚。为此我曾走访蒯斯曛同志,他知道汤增敷其人,但不认识,只知道他后来依附国民党,成了潘公展、陈德微手下的一名小喽罗。我查了查三十年代之出版书目,知道他出过一本诗集《姊姊的残骸》,出版者为草野社,也许就是编辑《草野》时自费出版的。李赞华进了现代书局后,曾与黄震遐等鼓吹民族文学,汤增敷可能也有份。他是否复旦出身,蒯老也不清楚。

信中朱雯、蒯斯曛虽只字未提汤增敷与世界文学函授学院之关系,但却说明其与相继担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的陈德微(1929—1930)、潘公展(1932—1937,后教育局并入社会局,改任社会局局长)交谊甚厚。然而,潘公展的另一身份却是《晨报》及其子报《小晨报》的社长、创办人,穆时英、姚苏凤等则是该报编辑。透过潘公展这一中介,汤增敷的社会网络,也与穆时英等人走向叠合。循着这一事实,不仅可以解释穆时英、姚苏凤等人缘何会同时担任世界文学函授学院教授,还向我们提示:是否该校的顺利创办与汤增敷直接相关?易言之,是汤与市教育局要人的关系,直接促成了这所学校的建立?复按该校招生启事及人事安排等,可知该校创校院长为汤增敷,董事会主席系沈天铎,另有教务长盛马良、事务长沈涧流、秘书长乐建等人共襄盛举,进一步证实前此之假设。

但是,这里的教务长盛马良,也是昔日中华国学研究会的骨干、后起的狂流文学会的发起人之一,事务长沈涧流则是狂流文学会成员。因此,该校由狂流文学会、中华国学研究会发起之说,虽与汤增敷发起说矛盾,但也绝非空穴来风,只是不谙内情者以盛、马二人参与校政而不免想当然耳,夸大了盛、马的作用而已。揆情度理,无论是募集经费,还是申请办学手续以至延聘教师等情事,院长汤增敷之角色殊为重要,几无可取代,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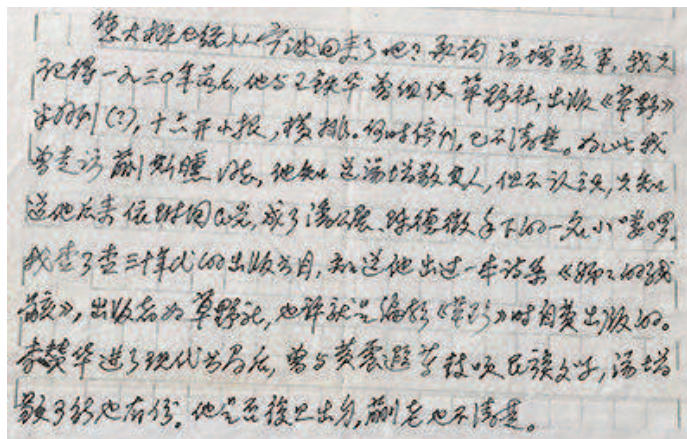
之者,则董事会主席沈天铎也。于此可见,汤增敷、沈天铎二人乃是该校当之无愧的创办者。

一则资料还显示,在穆时英兼任世界文学函授学院教授、滨海中学教师之前,亦曾任新亚学艺传习所讲师暨指导员。时为1933年10月,即其脱离哈脑维亚太阳灯公司之后一月。新亚学艺传习所创办于1933年9月,址设北四川路横浜桥北一三五号(诸多论著所记该校校址多有误),建有电影、戏剧、绘画、木刻、诗歌、小说、实用美术、声乐、舞蹈等专业,发起人有闵刚侯、陈万里、姚苏凤等五人,讲师暨指导员则由袁牧之、穆木天、洪深、沈西苓、陶晶孙、叶灵凤、姚苏凤、穆时英等二十四人担任。但据新亚学艺传习所学员黄新

之前,穆氏还有一段任职电影导演、编剧的重要经历,夙未有所发覆,笔者另有专文《作为电影导演的穆时英》,此处不再一一赘述。

尽管对穆时英职业生涯等生平事迹的考证,终究不能代替我们对其文学作品的批评,但回视其全部职业生涯,仍令人不免感触良多。穆氏职业生涯多所曲折、起伏,此固然是个人遭际与特殊的时代、社会不断遇合的结果,但在同时,也非常典型地折射出诸多欲作“职业作家”而不得的近代文人庶乎共通的心曲和大致相似的人生履痕。

事实上,放眼整个近代文坛,彻底的“自由撰稿人”或“职业作家”毕竟屈指可数,包括穆时英在内的大多数文人,并无此种福气。也正因此,他们不得不首先作为“职业人”而存在,



朱雯致陈梦熊手札(局部)

波、教师野夫等人的忆述(黄新波《我与木刻》,《木刻界》第4期;野夫《木刻手册》,文化供应社1949年7月再版),诗歌小说班后并未开设;实际担任教师者与创办之时所公布之师资名单,也有不少出入;且任一忆述亦只字未言及穆氏。因此,穆时英或并未在该校出任讲师暨指导员。更由于该校办学思想激进,旨在培养“进步人才”,是年冬即遭政府查封,此时,距其创办尚不足三月。穆时英即便在该校兼任(若有其他有效之史料可佐证),也不得不起身告辞。两年之后,穆氏跨进新闻业大门,成为一名报界新兵。

尾声

1936年4月,穆时英只身赴港。旅港时期,其先后作为《世界展望》《星岛日报》编辑的笔墨春秋,早已为众所共睹,勿劳详述,但应该强调的是,在此

不得不为“职业”而奋斗终生。或许夸张一点说,他们复杂而隐微的衷怀,波折而多变的恋爱、婚姻、家庭,以及自命不凡的文采风流,莫不与此息息相关。此种因科举制度解体而造就的近代文人的苦恼,既在不同程度上渗入他们的各种文字、书作、画作,也形塑着其精神世界的激昂、彷徨、矛盾与冲突,凡此,皆召唤今人从这一角再次揭起历史的大幕。

不过,从职业生涯这一视角切入近代文学、历史、思想文化的重新观察,已然超出了考证的范围,非本文所能论及。为免蹈书燕说、“过度诠释”之弊,文毕辄写数语如上,聊供关心此类问题之读者参考。

附记:笔者撰就本文之始,承蒙杨新宇教授惠赠其所编《我们的文坛》(即将出版)、徐自豪先生赐示其所藏近人书札、瀚堂数据库李雪静小姐鼎力襄助,雅意殷殷,铭感无已,书此谨申谢悃。

(作者单位: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史料中心)